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文学翻译审美学

王平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内容简介

其内固已，事就美事有翻文学文协更重而学文文学事从本
期，合能出更门味更察，得份创更所自的占自育，出时究研的善学
研个服有

文学翻译审美学

王平 著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11

2009.11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ISBN 958-7-13-08800-2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5.00元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审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审美规律,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和理论创新,深度和广度相结合,既有理论,也有实例,学术性和趣味性相结合。读者对象包括翻译理论研究者 and 文学翻译爱好者,也可作为翻译学研究生教材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审美学/王平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11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ISBN 978-7-118-06600-5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翻译—审美分析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347 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³/₈ 字数 333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翻译审美学引论	1
第一节 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本质	13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原则和标准	47
参考文献	71
第二章 译者的审美理想	74
第一节 译者的社会理想	74
第二节 译者的审美需要	78
第三节 译者的审美趣味	82
第四节 译者的审美人格	86
第五节 中国传统译学的审美标准	90
参考文献	92
第三章 译者的审美感知和想象	94
第一节 文学语言的形象化特征	94
第二节 译者的审美内在感知	95
第三节 译者的审美想象:神思	103
第四节 译者审美感知和想象的深化过程	111
第五节 译者的审美直觉和模糊思维	126
参考文献	130
第四章 译者的审美情感	132
第一节 作家的审美情感体验	132

IV

第二节	译者的审美移情体验·····	136
第三节	译者的审美情感流和话语流·····	152
第四节	译者的情感共鸣·····	163
第五节	译者审美情感体验的深化性·····	171
第六节	译者的翻译冲动·····	172
第七节	译者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	174
第八节	译者审美情感体验的“冷”与“热”·····	175
参考文献	·····	178
第五章	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判断 ·····	180
第一节	译者的学术研究·····	180
第二节	译者的文化阐释·····	182
第三节	译者的文本解读·····	185
第四节	译者的审美判断和思维机制·····	189
第五节	译者审美阐释中的“诗”与“思”·····	206
参考文献	·····	207
第六章	译者的审美个性和风格 ·····	209
第一节	作者的审美个性和风格·····	209
第二节	译者对原作风格的审美阐释和再现·····	212
第三节	译者的艺术风格·····	226
第四节	译者艺术个性的培养·····	234
参考文献	·····	238
第七章	文学翻译学的文化论 ·····	240
第一节	译者的文化阐释·····	240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审美理想比较·····	243
第三节	中西审美情感比较·····	258
第四节	中西文化的审美认识论比较·····	265

第五节 中西语言观比较·····	270
第六节 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272
参考文献·····	277
 第八章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客体·····	 280
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音美和形美·····	282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意象美·····	291
第三节 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	302
第四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情感美·····	306
第五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形象美·····	316
第六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风格美·····	325
第七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结构美·····	331
第八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简洁美·····	336
第九节 文学作品语言的意境美·····	342
参考文献·····	357

第一章 文学翻译审美学引论

第一节 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译界翻译学的构建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翻译界,围绕翻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更具体地说,中国翻译学的特色问题,有不少争论。刘宓庆、张柏然、孙致礼等人持肯定态度,张南峰等则看法相反。笔者认为,中国翻译学的特色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翻译有二层含义:一指翻译活动的过程,包含若干要素,可表示为:作者→作品→译者→译作→读者;一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作。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微观的,即研究翻译的结果,对原作和译作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语言转换。现代的翻译研究注重从宏观角度,分析翻译活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因素。一般说来,这些要素可分为三类:文本要素(原作和译作)、人的要素(作者、译者和读者)和文本外的要素(文化因素等)。因此,翻译宏观研究包含三个主要方面:语言系统研究、文化系统研究和译者主体性思维研究。翻译学理论也必须包括这三个方面研究的成果。这三个层次密切相关,关于翻译学理论的特色问题也必须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探索。刘宓庆先生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微观分析中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对许多价值概念都未确立系统科学的、始终一贯的范畴界说和符合现代逻辑学的定界分析,模糊性、印象性太强,内涵流变,难免见仁见智,而且往往流于空泛”,“本书是立意于开拓的一个尝试。作者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历史功绩,摆脱其局限性,努力对每一个翻译理论课题进行符合现代思维科学和逻辑学的科学证论,克服传统译论在概念定界中的内涵流变性,努力制定出重描写的翻译理论功能规范而不是规则。”^[1]

笔者认为翻译学应研究三类要素:文本要素、人的要素、文本外要素。文本要素涉及到语言学、逻辑学和中心学科;人的要素涉及到心理

学和文化社会学;文本外要素涉及到文化社会学理论。田菱先生在《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中认为翻译学包含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逻辑学、翻译学、各该门中心学科。方梦之先生在《翻译新论与实践》谈到了翻译的定义、性质、对象、任务、方法论原则、文体、风格等,认为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翻译学是“一门研究双语间信息传递的本质、过程、方法及其规律的学科,属于思维科学体系”。按照学科学理论,翻译学的建立有三个条件:“翻译学的历史渊源;翻译学的历史准备;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构架”。笔者认为翻译学的相关学科是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原作特点、译者的个性、翻译的社会性、翻译学各要素的互动性”。翻译学的任务包括“推陈出新,继承发扬。洋为中用,中西互补。加强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平衡发展,整体推进;普及译学知识”,翻译学的方法论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对比、调查、描写、论证”(1999:1-24)。

关于“对比”,我国翻译家都很重视这一研究方法。许渊冲先生提出要建立对比翻译学,并且重视译文比较,尤其是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的比较。关于“调查”,许钧先生曾就《红与黑》的不同译本进行过读者调查,涉及的读者层面很广,但如何看待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感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译者心中不能没有译语读者,另一方面,译者不能过分迁就译语读者的趣味。比如,有些世界名著原语读者都不好理解,也就不能指望译语读者能轻易理解。萧明翰先生曾对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喧嚣与骚动》中的明晰化倾向提出过异议。关于“描写和论证”,刘宓庆运用描写和论证方式提出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方梦之分析了译学的相关学科,关于哲学,他阐述了翻译研究的物质观、辩证性与时空观。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从翻译实践出发,重视语言转换研究,不沉溺于纯理论性的经院哲学式研究,避免导致思想上的混乱,也不只停留在语言分析的层面,不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这不利于译者的提高,不利于翻译教学。关于辩证性和时空观,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理论》中在这方面有深刻的阐述,

有些学者如张柏然等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赖以建立的基石和特殊的研究领域。这个基石就是哲学,因为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人的思维,因而都是思维的科学,哲学是思维的基础科学,被称为“科学的科学”,即一切科学的基础。翻译活动的中心主体是译者,翻译本质上就是译者的思维活动,翻译研究的核心是译者思维活动的规律,因此哲学也是翻译学的基础。翻译是社会活动,具有社会性,它涉及不同的符号系统,是信息(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过程。翻译学是理论的总结和系统化,它必须有实践基础。东西方翻译界几千年来已经提出了不少理论,翻译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些翻译理论大师提出的理论为翻译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的翻译学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艺术、美学渊源,反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美学观,体现出重译者个人的形象思维、感性体悟和审美欣赏的特点。佛经翻译家支谦认为翻译应“因循本意,不加文饰”,这一观点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支谦的“因循本意,不加文饰”意指译文达意为止,不必多加修饰,这体现了道家“朴素就是美”的思想。清末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强调译文的语言文体风格,于是朴素的翻译观开始向艺术的翻译观发展。后来,傅雷提出了著名的“神似”说,把译学自觉地引入美学领域。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一观点源于中国传统画论重精神、气韵和内涵,轻外在形貌的思想。与“神似”论齐名的是钱钟书的“化”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一理论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佛宗宣扬“悟”,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谈到:“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张柏然在《中国传统译理论的美学观》中把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天色归纳为“以中和为美,讲求和谐;尚化实为虚,讲求含蓄;重感性体悟,讲求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精神和整体性感性思维导致中国翻译学理论注重主体体验和价值判断。

可以说,中国翻译学理论在价值论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翻译学理论相比,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弱点在于方法论研究的欠缺,而科学的方法论是建立现代翻译学体系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加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翻译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中国翻译学理论在文化系统对比研究方面的特色应该是继承和发扬翻译理论的文艺学、美学传统,在此基础上,将价值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结合起来。刘宓庆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范畴研究及方法论中都借助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美学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和心理意识过程中。因此,中国翻译学之创建,如果忽视翻译美学,必将有损于大体,有失于特色,有悖于国情。”同时,中国翻译学理论应“重论证,摆脱唯心主义影响”,“人类思维形式是发展的,科学论证的手段也应当日趋严密。特别是我们在建立一门学科体系时,基本概念都应有科学的、严谨的界说,应力求避免模棱两可、含混其词”,“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史,灼见纷纭的翻译理论史;在历史上以及近代、当代有无愧于哲人及大师称号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植根于世所罕见的丰厚的中华文化特别是文学、美学、文论的土壤之中的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之芽,一定会成长为一棵挺拔苍翠的大树,自立于世界现代翻译理论之林”²。中西翻译学理论流派各有长处和优势,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实用精神,这对中国翻译学理论中的实用理论研究传统有很大的影响。张南峰先生认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往往只是进行文本比较,以原文为根据来评价译文;再加上忽视或回避意识形态以及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缺乏历史眼光,充分暴露了没有纯理论指导的应用研究的局限性”。这里纯理论是指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例如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吉迪安·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三因素论,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还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要界定“纯理论”这个概念,有必要审视翻译学体系的本体结构。

刘宓庆在《西方翻译理论概评》一文中将翻译学构架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个结构体系。翻译学的内部结构是本体结构,包含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信息工程三大部分。翻译理论是翻译学的主体构件,它包括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方法论、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教学法研究。翻译史包括翻译发展史及翻译理论史。翻译信息工程包括软件研究、机译技术理论和机译语言理论。翻译理论和翻译史是基础理论(纯理论),翻译信息工程理论是应用理论。而翻译理论之中,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方法论、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是基础理论(纯理论),翻译教学法研究是应用理论,是“技能意识的应用研究”。翻译学外部系统包含三大部分:哲学、社会文化、语言符号。它们是“翻译学的基本价值观念系统”,又是“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参照系统”³。对翻译学内部体系的研究要取得深度,离不开对外部系统的研究。翻译学内部体系理论是微观理论,外部体系理论是宏观理论(纯理论)。首先,翻译学外部系统的语言符号研究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二种语言(原语和译语)系统的对比研究,而内部系统的翻译基本理论(包括语际转换的意义机制、结构形式、交际功能等)、翻译方法论、翻译程序论都是建立在二种语言系统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翻译学外部系统的社会文化研究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二种文化(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系统的对比研究,而内部体系的翻译基本理论(包括翻译的实质、原理和标准,可译性问题、语际转换中的文化模式及对策等)、翻译史研究都是建立在二种文化系统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第三,翻译学外部系统的哲学研究主要是对译者主体思维的研究。相对于语言符号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哲学研究是翻译学理论的一个薄弱环节。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基础科学,被称为“科学的科学”,即一切科学的基础。田菱先生在《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中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方法——哲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次高层次的方法——一般科学方法(跨学科)”;“最低层次的方法——专门科学方法(单学科)”⁴。

翻译活动的中心主体是译者,翻译本质上就是译者的思维活动,翻译研究的核心是译者思维活动的规律,因此哲学也是翻译学理论的基石。杨自俭先生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知道翻译学涉及到许多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它的

内在规律,是翻译过程中人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因此翻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翻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科学。”⁵ 相对而言,翻译学外部系统的思维研究是对翻译活动中译者思维活动规律的共性及其与整个人类思维活动规律的共性之间的联系的探索,而翻译学内部系统的翻译基本理论中的翻译思维研究是对译者个体思维活动规律的探索,它建立在译者思维活动规律共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方梦之在《翻译新论与实践》中分析了思维的共性和个性、思维结构、翻译思维的种类、思维方式。贾正传先生在《融合与超越:走向翻译系统辩证论》中认为翻译在总体上一种“语言转换性、艺术再造性为核心并兼具信息传递性、审美交际性、社会交往性、文化交流性等多重性质的复杂的人类活动系统”。蔡新乐先生在《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中指出翻译研究应“既坚持理性的反思精神,以求思想的逻辑性与研究对象所形成的现实相符合;同时又不忽略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员应有的艺术作用与意义,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以及人自身对自由的追求与无限神往的要义”。除了艺术论和科学论之外,翻译研究还有第三条道路,即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对‘存在’中的人与翻译的关系问题形而上的理论反思以及人在‘翻译’之中的存在表现等理论问题的探讨。”⁶ 翻译学的哲学研究,除了探索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思维活动的规律,还要确立翻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就形成了中国的翻译哲学。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原理》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比传统的道家、佛家思想更为先进科学的哲学体系,确立为中国当代的翻译哲学。他指出:“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翻译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主观客观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学外部体系的三大部分“哲学、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确切地说,“译者主体性思维、二种文化系统对比研究、二种语言文字系统对比研究”是整个翻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理论。张南峰提到的纯理论(“翻译研究学

派”等理论)只是文化系统对比研究和语言文字系统对比研究中的一部分。目前,翻译学研究的难点是译者主体性思维,翻译学研究要想取得重大进展,必须以这个领域为突破口。翻译界应加大在此方面的研究力度。

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贯穿着语言活动、思维活动、文化活动,三者紧密相联,构成一个整体。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精神实质;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又是思想的基石。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思维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包含了很多因素,比如动机、情感、意志、态度、思维方式等。它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就共性而言,思维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理机制,所有民族都有喜、怒、哀、乐等基本的情感,都遵循逻辑推理、形象思维等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译者的思维心理活动也不例外地具有这种共性;就个性而言,人类的思维活动又受到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各民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民族思维个性的产生,这尤其体现在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上。前面提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意向性和具象性的特点,这种民族思维个性对中国翻译事业影响深远,“重神似不重形似”成为长期以来中国翻译界人士奉守的标准,已深深植根于中国译者的思维意识之中。因此,译者的主体性思维既具有人类思维活动的共性,又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思维个性的烙印。到目前为止,译界对译者主体性思维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对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译者思维方式的研究上,对译者思维活动所包含的其它因素研究力度不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多领域还是空白。因此,译者的主体性思维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一向有重主体,轻客体的传统,重译者主体性研究,轻译本客观性分析。但是由于科学方法论的欠缺,译者主体性思维研究长期停留在主观感悟、体验的层次上,没有深入到译者思维机制的内在本质,零散而不系统,未能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因此,对中国翻译学来说,在译者主体性思维研究方面,应多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手段,对涉及译者思维、情感的有关学科领域,尤其是心理学,进行深入广泛的探索。

翻译界关于中国翻译学理论特色的争论,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中

国翻译学”这个提法本身认识不一。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的提法不妥,“中国翻译学只是地区翻译学中的一种”,“中国又有许多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汉语还有许多方言区,各有其次文化,港、澳、台甚至有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说有理由要建立中国翻译学,那么,也同样有理由要建立广东翻译学甚至香港翻译学,如此等等。”⁸ 笔者认为,“中国翻译学”的概念是与西方翻译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西方翻译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印欧语言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翻译学理论则主要是建立在汉语语言文化基础上的,两者形成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流派。西方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的提法更具有整体性。如果把中国翻译学改为汉语翻译学,那么西方翻译学则应该改为印欧语翻译学。如果说中国翻译学可以分为广东翻译学、香港翻译学等,那么西方翻译学则可分为英语翻译学、法语翻译学、德语翻译学等,这种提法显然牵强。因此,从科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和整体性考虑,中国翻译学和西方翻译学的提法比汉语翻译学和印欧语翻译学的提法更为恰当。相对于西方翻译学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翻译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必须肯定。目前,翻译界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翻译学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一问题,也认识不一。但有一点已是基本共识,即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趋势,中国翻译学研究发展的唯一之路是开放交流,与其它语言文化的翻译学理论,尤其是西方翻译学理论,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以求得发展。但如何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如何看待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现状。中国翻译学研究整体上落后于西方,这是现实情况。中国翻译界大规模引进和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而明确地提出建立翻译学,并开展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则是近十年来的事情。虽然在此以前,黄龙教授已写出了《翻译学》(Translatatology),但该书主要是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延续,对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利用不多,因而其影响力有限。在中国翻译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成果是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但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规模和质量而言,中国翻译界和西方同行仍有不小差距。面对现实,中国翻译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承认差距,另一方面,认真思考造成这种

差距的根源所在,找出适合中国翻译学发展的策略。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出问题所在,下药要先对症。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就是只有应用翻译学而没有纯翻译学”,“以目的论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应用翻译学开展了一千多年,仍然远远未能达到其目的,即制定出适用于一切翻译的标准,可说是失败的,证明研究目的或方法有问题,或者两样都有问题”。对中国近两千年的翻译史进行反思和总结,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深厚背景,必须从其中追本溯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注重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和感性体悟,缺乏西方文化中的那种超越性探索精神,主体对客体属性的逻辑分析和事实判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民族思维心理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对此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这种民族思维心理对我们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有着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培养了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就理论和实践来说,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更注重实践,注重理论的实践基础,注重译文的质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译品。因此,对中国翻译学理论研究来说,应用理论研究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应该保留和继承。同时,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加强翻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这里有必要明确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前面提到,翻译学宏观研究有三大领域:语言系统对比研究、文化系统对比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刘宓庆提出了翻译学体系外部结构的三个方面:语言符号、社会文化和哲学。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三大范畴。

对中国翻译学研究来说,语言系统(语言符号)对比研究必须以汉语为基点,力求把汉语这一外部形式看似简单,而内部形式十分复杂的语言的结构和规律了解透彻。根据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要真正了解一门语言,如果不与其它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是无法做到的。有对比才能见出差异,见出特色。中国语言界和翻译界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从清末开始起步,不少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在汉英语言对比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刘宓庆先生长期从事汉英语言对比研究,并结合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但要把翻译学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语言系统对比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扩大和提高,汉语与法语、德语

等其它印欧语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待加强。在翻译学理论研究中,文化系统对比研究起步要晚于语言系统对比研究。这个领域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以及研究的难度远远超过后者。翻译学理论中的文化研究,重点放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翻译界不少学者在这个方面辛勤耕耘,成果丰硕。罗新璋、马祖毅对中国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张今对翻译哲学观的研究,张柏然对中国译学理论的文艺学、美学传统的研究,刘宓庆对汉语表现法与思维机制的研究,都令人瞩目。对中国翻译学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对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发展正面影响何在,负面影响何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深厚的文化基础,张卫中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向”型文化,重继承,轻开拓,因此中国现代翻译学研究正确的发展道路只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事实上,国内翻译界学者对这一问题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姜椿芳在中国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⁹

对于中国翻译界来说,构建翻译学不能闭门造车。在对待西方翻译学理论上,要端正态度。首先是承认差距,其次是虚心学习,诚心求教,批评性地接受西方译论,吸取其精华之处,用以丰富本民族的译论。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包容力,为有益的外来理论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何排外心理都不利于中国翻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只能使其回到老路,原地踏步,这个局面是翻译界广大人士所不愿看到的,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自悲,更不自大。中国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硕果累累的以文学创作、翻译为形式的实践,但由于在科学方法论上的欠缺,因而在文化、语言系统方面的研究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发展程度和水平远远滞后于实践活动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翻译界来说,研究西方翻译学理论,最重要的是借鉴和学习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论作为研究工具,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中国文化、艺术、语言的丰富遗产,结合我们在价值论上的传统,使我们的翻译

学研究在发扬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具有时代特色,跟上时代的步伐。一方面,中国翻译界在文化系统对比研究和语言系统对比研究方面要借鉴西方先进的方法论,以弥补自身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西翻译界都面临着一个研究难题,即译者的主体性思维活动。这是当前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目前和将来翻译学研究应努力的方向。由于思维活动牵涉到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因而,研究起来相当棘手。但正因为有难度,翻译学研究者才应该知难而上。译者主体性思维研究是关于翻译活动的本质的根本性课题,如果翻译界回避这个课题,而把全部或主要精力放在“多元系统论”、“目的论”、“三因素论”等理论上,难免有“舍本”之嫌。

中国翻译学研究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即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在文化系统对比研究、语言系统对比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思维研究三个领域,认真、扎实、深入、广泛地进行长期不懈的钻研、探索,但仍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顶着“实用研究”的帽子,这给译界进行基础理论研究造成了心理障碍。要消除这种心理障碍,笔者认为,正确的方法不是抛弃“实用研究”,而应该是将“实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刘宓庆提出中国翻译理论模式的特色是对象性和对策性,译界颇有争议。笔者认为,对象性和对策性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中国翻译理论模式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原则是刘宓庆先生在对汉语和印欧语二种语言系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汉语语言文化的实际情况,对汉、外互译有指导意义。中国翻译理论模式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原则是在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与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双语转换的个案分析相结合,因此它既有宏观的理论价值,也有指导实践的微观价值。刘宓庆先生的工作不是纯粹的“实用研究”,而是实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二者的统一。

前面谈到,中国翻译界应加强在翻译学基础理论三大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力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翻译界,基础理